

维新时期地方学会、学校与报刊阅读的拓展：以湖南为中心^{*1}

蒋建国

【摘要】：维新时期，《时务报》执新思潮传播之牛耳，各地维新报刊群起而响应。而地方社会学会、学校与报刊之间的互动互进，对维新思潮的地域化传播起着重要作用。尤其是湖南的南学会创办报刊、开办讲会、倡导维新，推动了学会、学堂与报刊的一体化发展。而《湘报》《湘学报》等地方报刊的广泛阅读，促进了维新思潮的“在地化”发展，对湖南地方“意义之网”与社会风气有着深刻的影响。

【关键词】：维新；湖南；学会；书院；报刊

列斐伏尔(Henri Lefebvre)指出：如果未曾生产一个合适的空间，那么“改变生活方式”“改变社会”等都是空话^[1]。也就是说，无论是意识形态还是思想文化都需要“在地化”，没有“地方”，就没有思想生成的基础。而地方具有物质、功能和意义三重属性，其中地方意义包含象征意义、思想感受和行为价值等等，地方具有特殊的身份和特性^[2]。“地方空间”是社会组织和个人具体的“所在”。正如卡斯特(Manuel Castells)所言，事实上，绝大多数的人，不论是在先进或传统社会都生活在地方里，并且感知他们的空间是以地方为基础的空间。地方乃是一个其形式、功能和意义都自我包容于物理临近性之界线内的地域(locale)^[3]。从这个层面上看，探讨维新时期的社会思潮，就不仅仅以《时务报》为中心来分析其在全国的影响，而应从“地方”的角度，进一步研究各地的维新派如何因应新思潮而进行“集体表达”，并如何促进学会、学堂、报刊传媒的一体化发展，使维新思潮与“地方性知识”有机结合，引发士林的广泛阅读和关注，从而促进维新变法活动的“在地化”，建构地方文化的“意义之网”。因此，“地方”是个体、社群与社会建立联系的纽带。“这种地方性不仅指地方、阶级与各种问题而言，并且指情调而言——事情发生的经过自有地方特性并与当地人对事物之想像能力相联系。”^[4]从这个角度看，探究全国各地尤其是湖南的维新活动，既需要以“他者”的眼光进行“深描”，又必须结合地方学会、学校与报刊阅读的具体情境，探讨维新思潮在地方社会的传播与影响。

一、维新时期地方报刊、学会与学校的一体式发展

维新时期，《时务报》不仅引领舆论、推动社会变革，它还作为当时新式报刊的坐标，为中国报刊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。在《时务报》的影响下，杭州、天津、澳门、广州、长沙、重庆、南昌、武昌、桂林等地相继创办了一系列维新报刊，如《国闻报》《知新报》《蒙学报》《农学报》《湘学报》《集成报》《博闻报》《岭学报》等等，这些报刊或受到汪康年、梁启超之启发，或得到《时务报》馆的支持与帮助。而《时务报》的传播模式又随其散布被地方中下层的开明人士所仿效，流传全国，成为分散各地的士人表达思想、发挥影响力的新工具^[5]。据不完全统计，从1895年至1898年，全国出版发行的中文报刊有120种左右，其中约80%是中国人自办的。以资产阶级维新派以及与它有联系的力量创办的报刊，数量最多，影响最大^[6]。这些新式报刊以推动维新运动为己任，以各种学会和团体为依托，以新式知识分子为中坚，推动报刊、学会与学校三位一体的全面发展，而报馆则在其中起着引领社会思潮的基础性作用。宋恕在《〈自强报〉公启》中说：“今天下竞言自强矣，自强之源在学校、议院、报馆，夫学校、议院，权不在士，报馆则是兴有责焉。”^[7]宋恕认为开报馆是“士人”可以较为主动和便捷的“自强途径”，梁启超也认为，学会固然重要，但是“其数甚微”。因此，“度欲开会，非有报馆不可。报纸之议论，既渍于人心，则风气之成或不远矣”^[8]。而报馆与学校之间则互为表里，相互依托，在促进文化传承与民族复兴方面均不可或缺。《国

¹ 作者简介：蒋建国，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，博士生导师(广东广州 510006)

基金项目：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“多卷本《中国报刊阅读史》”(16ZDA222)

闻报》的一篇时评对二者之间的关系作了深入探讨：

盖学堂者，报馆之心腹也；报馆者，学堂之吭咽也。有学堂而无报馆，则诸学之径涂，仅能课诸学堂以内之人，必不能课诸学堂以外之人。是曰域其量也，是曰钥其门也。是涨力无出也，是吸力未广也。此非创立学堂之神旨也。有报馆而无学堂，则报章中之所报，仅能以报学外之事，必不能以报学中之口(事)。是犹川无源也，是犹口无本也，是犹人无筋络以贯通也，是犹物无杂质以化合也。此非开报馆之实效也，不过翻译西报供人玩观而已，于天下仍无裨也。故我二者须相辅而行，方能持久。有报馆以为学堂之康衢，则学堂必大；有学堂以为报馆之起址，则报馆必永。二者联为一气，而黄种不难长存矣。

……是故以学堂供报馆之目录，以报馆树学堂之风声。二者相须，如景随形，如声赴音，并驰联轡，敬业乐群。则以学翼教，以教辅政，神明之胄，庶有瘳乎。^[9]

在维新时期，报馆、学校、学会三者之间相互融通，以“合群”“乐群”为目的，共同促进新政、时政、西学的传播。梁启超指出，国群曰议院，商群曰公司，士群曰学会。而议院、公司其识论业艺罔不由学。故学会者，又二者之母也。学校振之于上，学会成之于下^[10]。学会是实现“合群”“乐群”的前提，是维新活动赖以实现的组织基础。尽管在维新时期各地成立了不少学会，但其与学校、报刊之间尚不成比例。故此，有评论认为：凡士农商贾，当各设学会，不成则官长劝之，殷富助之；成则上之大吏达之，朝廷以嘉其功以励其志。由是而不拘耕作艺术，皆跟风效法，自相濯磨，不及十年，当斐然可观。富强之效，如操左券矣^[11]。在论者看来，学会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公共组织，只有学会日渐发达，开民智、求富强方有基础。

因此，有组织的团体是推动报刊阅读的重要力量。一些开明官绅与学生结合在一起，他们以学会团结同志，以报刊抑扬舆论，以学校培育人才。有的学会自办报刊，如上海务农会办《农学报》、新学会办《新学报》、算学会办《算学报》、译书公会办《译书公会报》、蒙学会办《蒙学报》，广西圣学会办《广仁报》等等^[12]。报纸成为推动学会发展的重要力量，正如托克维尔所言，“报纸使他们结合起来，但为了使结合不散，他们继续需要报纸”^[13]。报纸成为连接学校、学会的重要纽带，在制造和传播舆论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
《时务报》作为维新报刊之翘楚，引领着新式报刊的发展方向。正如蔡元培所言：“我国人思想之稚，观于言论、实事之间，已可概见。丁戊之际，有《时务报》，始欲以言论转移思想，扶摘弊习，有推陷廓清之功；其后有《知新报》，参以学理；有《湘学报》，参之以掌故。嗣是人心为之一变。”^[14]而维新时期的报刊阅读，也是在《时务报》的影响下，由通商大邑向边远地区逐步扩张。

在《时务报》的影响下，各地学会创办的报刊种类繁多，如时政类、科技类、文摘类、专业类报刊等等。各地学会因地制宜，有针对性创办适合自身特色的报刊，如蒙学会创办的《蒙学报》、务农会创办的《农学报》，译书公会创办的《译书公会报》、新学会创办的《新学报》，女学会创办的《女学报》，工商学会创办的《工商学报》，蜀学会创办的《蜀学报》，圣学会创办的《广仁报》等等。一些志趣相投的官绅，往往利用松散的组织和社会网络筹资办报，尽管许多报刊存在的时间很短，且影响不广，但是维新时期的报刊总数相当可观。除了一些通商口岸之外，湖南、江西、四川、贵州、广西等地也相继创办了一些报刊，地方性报刊的崛起，有利于报刊阅读的空间扩张和地域性阅读群体的发展。如蜀学会创办《蜀学报》之后，要求“省垣入会者，以阅报为首务”^[15]。开办三个月之后，该报便声称：“本馆自开报以来，逐渐推广，现在销售几及二千份，纸张务极坚洁，刊印格外精审，购者源源而来，仍有应接不暇之势。”^[16]

与《时务报》这样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大报相比，许多地方性报刊发行范围有限，但它对当地社会却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。曾出使欧洲的宋育仁对四川地方报刊价值的认识颇有代表意义，他对汪康年说：“蜀报诚不如《时务报》之美，但西南仅此发端，拟析鼎力为助，以广边隅风气。可否贵报一律行蜀者，交《渝报》馆代售？在省寄省，则人皆一取两得。庶初开之铺，不为老招牌所压，俟盛行后再易新章，如蒙许可，即望赐覆为颂。”^[17]宋育仁认为，《时务报》固然很好，但是本地报刊的发展更需要扶持。因此，《渝报》在创办之际，便利用本地资源，号召当地官绅捐款，且将捐款和阅报结合在一起。其章程规定：

捐助百两以上者，每年送阅报五分；五十两以上者，每年送阅报三分；三十两者每年送阅报一分。均无报费。

各府州县各就其地，托一友人采访要件，按月函知，并托代为售报，不必加以访事名目，亦勿庸议给薪水，但按期送报一分，以搭酬劳。

阅报费先交银十两者，送报五年；先交洋银十元者，送报三年；先交银三两者，送报一年；先阅后交银者每年银三两六钱，闰月照加，折购者每册九分。

先阅后交费者，本城送满一月，外境送满三月，皆须收费始行续送，以示限断。^[18]

章程将社会捐助、读者先期订阅与来稿予以特殊的优惠，将赠送报纸作为回馈社会的重要手段，从而能够推动该报在本地社会广为流布。这在地处偏远的重庆，具有一定的营销效果；对重庆读报风气的形成，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。另外，《岭学报》《广仁报》等维新报刊的章程中亦有类似规定，以广纳资金，推广阅读，扩大影响。

二、维新时期湖南的学会、学校与读报风气

维新时期，学会是团结士绅的重要组织，也是报刊赖以生存的凭藉之所。如《时务报》利用强学会的余款而设，表明了它与维新派有着直接的关联。全国各地学会将设立报刊作为其重要的工作内容，许多学会附设报刊，以鼓吹新政，提高学会在地方社会的影响力。在维新思潮的影响下，湖南的南学会得到了陈宝箴、黄遵宪、徐仁铸等地方大员的鼎力支持，又有梁启超、谭嗣同、唐才常等维新人士的积极推动，加上延请湖南著名学者皮锡瑞任会长，湖南士风为之一变。1898年2月21日，南学会第一次正式开会，“官绅士民，集者三百余人，堂上设讲，座下排横桌，听讲者环坐焉……士大夫周旋问答，言笑晏晏”^[19]。南学会的主要活动，尤其是皮锡瑞、谭嗣同、黄遵宪、邹代钧等人的讲演，都在《湘报》刊布，而《湘学报》“系学会捐资创议，不收捐助之费”^[20]。作为附设于南学会的报纸，《湘学报》首先要确保会员能够及时阅读，这是“组织化传播”的重要特征。由于有具体的办报章程和较为充足的经费来源，《湘学报》可以完全按照南学会的意图办报，其发行也得益于南学会的推动。

作为南学会的主要支持者，湖南巡抚陈宝箴首先要求省内士绅和学堂学生广为阅读。《湘学报》甫一创办，他便饬令：兹《湘学新报》之设，悉本此议，且为湘中承学有得之言，于本省人士，启发尤为亲切。定章每月刊发三册……为此，札仰该县于奉到后，先自捐廉赴省订购，每次或数十册，或十余册，分交书院肄业各生及城乡向学子士，一体披阅。并劝绅富自行购买分送。俾乡寒峻，皆得通晓当世之务，以为他日建树之资。所费无多，为益甚大^[21]。而湖广总督张之洞则要求湖北全省书院生徒阅读《湘学报》，他认为《湘学报》“考核精详，确有实用……有关民生，均为方今切要。学术治术，自宜广为传布。除省城两湖书院发给五本，经心书院发给二本，本部堂衙门即抚学院司道荆州衙门各一本。由善后局付给报资……所属各州县，将以上两报一体购阅，《湘学报》并应发给书院诸生阅看”^[22]。可见，书院与学堂在报刊阅读中起着重要作用。晚清湖南书院、学堂较为发达，尤其是时务学堂创办之后，极为重视西学教育，其功课中西学以“各国文字为主，兼算学、格致、操演、步武、西史、天文、舆地之粗浅者”。要求学生“豫储远大之器，必使兼通中外”^[23]。时务学堂积极传播新学，参与维新运动。南学会成立后，每次举办演讲，都有大量时务学堂的学生前来听讲，并积极参与南学会的“问答”，探讨新学和时政热点，从而使学校与学会之间在教学、社会实践方面有着紧密的联系。南学会“会友”有三种方式：“议事会友”“讲会会友”“通信会友”^[24]。从而将有志于维新者通过广泛的交往途径结合起来，极大地推动了维新思想的组织化传播。这也是湖南维新报刊能够在本地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重要原因。

南学会的熊希龄等人为了“补《时务》、《知新》、《湘学》之不逮”^[25]，于1898年3月7日创办了湖南近代第一家日报——《湘报》。熊希龄在写给汪康年的信中说：“《湘报》风声全省皆知，望我出报甚切，乞速办就机器寄湘，别事尚可缓，此事务乞拨冗代办也。”^[26]熊希龄对《湘报》寄予厚望，希望该报“专以开风气，拓见闻为主”^[27]。正如后来文廷式在为《湘

报汇编》作序时所言：

《湘报》者，创自长沙，起于戊戌。垣宿当躔之日，而明德作镇之年。俊侣骈生，畸人朋出，联袂云合，楮墨斯腾。标题已确，是南国之良金；毖记遥传，应西人[江]之天马。英才既集，宏论方多，清议之风，斯为称盛！

……每诵斯文，至于雪涕。嗟乎！谁与独处，悲生雒浦之衾；岂其无人，泪堕山阳之笛？悼往者之不作，感来日之大难。故知落叶自陨，无假于疾风；相思不断，且同于春水。^[28]

《湘报》发行后，“无论官绅士商，均送报半月，不取报资，半月以后，有愿阅者，请知会送报人挂号注明姓名居址，以便按日送报”^[29]。不久，“各府风行，湖南热力因为之一动……视学堂、学会为尤捷”^[30]。读者张翼云读《湘报》之后，“呜咽声嘶，流涕被面”^[31]。《湘学报》《湘报》在湖南各地的流传，对维新思潮的“地域化”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。谭嗣同不无自豪地宣称：“湘中风气果开，自《湘学》出报，读者咸仰湘才若在天上矣。”^[32]在谭嗣同看来，《湘学报》已成为湖南维新运动的象征，展示了湖南维新人士的学养和风格。

谭嗣同在《〈湘报〉后叙》中指出：“夫言新于今日，其惟吾湘乎？”湖南维新运动的广泛开展，得益于开明官员和地方士绅的推动，谭嗣同便认为：“假民自新之权以新吾民者，厥有三要，一曰：创学堂，改书院……二曰：学会……三曰：报纸”，而报纸可以跨越时空，使“不得观者观，不得听者听”^[33]。《湘学报》与《湘报》出版3个月后就发行至6000份，并很快在湖南各地广为传阅。以长沙为例，“销《湘学报》前数百分，销《时务报》又千余分。”而当时的南京“销《时务报》仅及二百分”。所以，谭嗣同感叹道：“盖风气之通塞，文化之启闭，其差数亦如此矣。”^[34]

报纸销量是检视社会开放程度的重要标志。湖南在维新之前，鲜有报纸发行，而《湘学报》与《湘报》立足于湖南市场，注重以新学启发本地士子，两份报纸对本地新学动态也颇为关注。尤其是《湘报》出版之后，对南学会和湖南学界、政界的报道较为深入，如南学会演讲、南学会问答，以及湖南各地学会、学堂的动态等等，记载颇详。又如时务学堂入学考试试题，各班学生名单等详细情况，以及时务学堂学生参加南学会问答的活动，《湘报》都加以刊登，可见该报对这所湖南维新时期“样板”学校的关注。而时务学堂的学生也是该报的重要读者和撰稿群体，据统计，时务学堂有10名学生在《湘报》上发表了17篇重要文章，这在当时的维新报刊中是极为罕见的现象。时务学堂的学生与南学会、《湘学报》《湘报》保持的密切关系，说明了进步学生已崛起成为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，在接受新学、传播新知方面已走在社会的前列。

《湘报》不但为湖南官绅与学生所关注，它还广泛联系社会各界人士。其章程第五条规定：

本馆拟广求博学通达者，立为报友，造册注明姓名字籍贯居址，按日送报，不取报资。如以所著论议及访求确实新闻新事函知本馆，酌核照登者，每届年终计算所寄之文多寡，准于本报余利项下抽提两成作为花红，分寄各报友以为酬劳之资。^[27]

值得关注的是，在《湘报》之前，很少有报刊将读者称之为“报友”，“报友”意味着办报人与读者之间存在情谊，而非冰冷的买卖关系，这显然将读者的定位为“报纸共同体”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并希望“博学通达”的报友为报纸的发展充分贡献才智。《湘报》注意发表读者的稿件，根据读者发稿情况给予回报。如衡南人杨则在《湘报》第14期上发表了《论阅报之有益》一文，第48期的“报友题名”中，便列出了杨、熊崇煦、易鼎、刘颂虞、罗棠、毕永年、洪文治等12人为报友，并为他们免费送报一年。这一方面提高了“报友”的知名度，另一方面又激励读者投稿，从而使一些默默无闻的读者能获得经济报酬与社会声望。一些时务学堂的学生正是通过投稿而与《湘报》与南学会建立广泛联系，实现了“学生议政”的梦想。

为了进一步扩大报纸的资讯来源，《湘报》还注重发挥送报人收集和采写新闻的作用，在章程中制定了一系列奖惩措施：

送报人遇有本城新闻新事，探听确实者，立即报知本馆主笔处核定。可否照登，由主笔转告账房，给一凭条，注明某人所

报之事，量其难易，分别一二三等，归月底结算，发给赏号。如有诬报，希图奖赏者，除扣赏外，罚钱三倍。^[35]

不仅如此，针对湖南地处偏远、各地购阅报纸较为困难的现状，《湘报》力求使其发行延伸至偏远乡村，为下层民众提供精神食量。其章程第九条规定：

本报与学堂、学会联为一气。凡各府州县穷乡僻壤不能购报者，应请各府州县分学会会友查明市镇村落，总汇地名，函知本馆酌计每处捐报数分，由省城总学会设法寄至各府州县分学会会友，转交居乡会友，择地张贴墙壁。如官府告示及劝善格言之法，俾众一览咸知，以示同仁之道。^[27]

这一规定进一步表明了《湘报》与南学会的依存关系，南学会作为湖南维新时期的地方团体，具有明显的“公共性”。对于南学会的性质，梁启超认为它“尤为全省新政的命脉，虽名为学会，实兼地方议会之规模”。其目的是要“激发保教爱国之热心，养成地方自治之气力”^[36]。为了推动《湘报》阅读的地方化，南学会利用了其在全省各地分会的优势，将《湘报》在偏远乡村发行作为分会会员的重要职责，并通过在乡村“贴报”的方式，确保乡村民众能够广泛地阅读《湘报》，显然，《湘报》推出这一重大的“惠民”举措，打破了传统的精英读报方式，使那些地处偏远的民众能够“去塞求通”，这在当时的维新报刊中是难得一见的^[37]。

李抱一评价《湘报》在当时的影响：“在世虽数月，而声光灿然，言湘政者莫不稽焉。”^[38] 欧榘甲也对《湘报》给予极高的评价，他指出：昔者谭烈士嗣同，唐烈士才常，开《湘报》于长沙，日日发论湖南之当自立，如萨摩长门之于日本，慷慨激昂，全湘风动。湘人以军功闻天下，号强悍，至是知外事，知爱国，有国家思想焉。是为中国省报言自立者之始^[39]。1898年9月16日创办的《菁华报》在章程中称“陈右帅所设《湘报》，极为雅驯”^[40]。尽管《湘报》仅发行数月，但它已深入到湖南民间社会，对维新时期湖南新学的传播起着重要作用。

三、湖南的学会、书院与公共读报活动

南学会以讲学、集会、研讨、阅读为重要内容，甫一创设，就对公共阅读问题十分关注。专门“设藏书楼一区，广度图书”^[41]。《南学会申订章程》明确规定：本学会所藏书籍，准人领取阅书凭单，入内浏览……自本月十五日起，愿阅报者，照单领凭择观。其时，南学会订有26种报刊，共计89份，所订各报及份数见表1：

这份名单基本上囊括了当时全国发行的主要报刊。南学会根据报刊的性质决定所订报刊的数量，如维新报刊《时务报》《知新报》《湘报》《湘学报》等各备10份，《申报》《沪报》等商业性报纸则仅备一份。由此可见，南学会所开辟的阅览室，将订阅的国内外主要中文报刊作为公共读物提供给公众阅读，这与单个读者的私人阅读有着很大差异。读者来到南学会的阅览室，需要办理借阅手续方可入内，并需要遵守阅读规则，由于有许多读者的“在场”，读报纸就具有共同的场域感，读者在读报的时分，可以感受到公共阅读的诸多好处，如读者通过阅读不同种类的报纸，对各报的内容与形态有着直观的比较和借鉴，不同的思想与观念随着报纸的“流动”而不断变化。对于平时难有机会接触报纸的读者而言，阅览室打开了通往外部世界的窗口，而那些经常来阅览室读报的读者，每次读报的时分又成为一种仪式，读报纸成为一种精神享受和文化信仰，报纸的“公共展示”为阅读的集体化、规范化、仪式化创造了条件。而此前，虽然强学会也有公共集会活动，却很少将大众报刊提供给公众阅览。从这个层面上看，南学会开创了近代报刊公共阅读的新空间，它进一步融合了读者、学会与报刊的关系。一些读者在读报之后，又能有机会参与南学会的讲演和问答，他们在报纸上获得的知识 and 产生的疑问，通过学会的公共集会得以传播和解答，从而使“公共阅读”转向于“公共讨论”。尽管我们难以统计当时读者的具体数量，但是，这批早期进入公共阅览室的读者，无疑对“博览群报”有着切身的感受，而由于读报所形成的“阅读文化圈”又能进一步开阔读者的视野，读者从个人空间走向公共空间，使读报的意义有着极大的改变。

表1 南学会所订报刊及份数^[42]

报刊名称	份数	报刊名称	份数	报刊名称	份数
时务报	10	申报	2	广智报	1
万国公报	1	新闻报	1	知新报	10
苏报	1	国闻报	5	格致新报	5
大公报	1	求是报	1	汉报	2
农学报	5	维新日报	1	岭学报	1
奇闻报	1	沪报	1	博闻报	1
循环日报	1	环球报	1	实学报	1
湘报	10	蒙学报	5	湘学新报	10
香港华字报	1	译书公会报	10		

由于时务报刊“议论切要，采择谨严”，以议论时局、促进维新为目的，显然有别于一般报纸的新闻报道。开明官员将时务报刊视为考察时务、学习新学、开发民智的“书”，一方面要求学子认真精读，体悟其意。另一方面又表明它不属于传统的书，它的内容涉及“一切舟车制造之源流，兵农工商之政要”^[43]。当时湖南一些书院制定的轮流阅读制度，将报刊视为知识读物而具有普及教育的功能，如当时著名的岳麓书院就规定：“购时务报六分，每二斋共阅一分，由管书斋长随时派人分送，每斋自第一号起，尽一日之力，或翻阅抄眷，或略观大意，各从其便。次日递交第二号，以次至末，再递交第二斋第一号，复以次阅毕……仍缴归管书斋长收存，备来岁住院士子依次领阅之用。”岳麓书院等书院的“阅报章程”表明，当时在学生斋舍推广的“轮流读报”制度，规范了学生读报的程序和进度，极大地提高了报纸的阅读效率，而学生读报与评报的结合，进一步提高了报纸阅读的深度和广度，学生在宿舍或者教室对报纸内容所进行的讨论，具有“公共领域”的性质。在这个具有相对自由的话语空间，学生之间的交流对新思想的认知会得到极大的提高。维新时期，湖南时务学堂的一些学生在《湘报》发表评论，表明他们已经将报纸视为延伸自己思想的载体，读报与投稿的结合，是知识接受与传播的互动，报纸作为“知识纸”“思想纸”的作用进一步彰显。

可见，书院订阅报刊，目的是让所有学生都有机会读报。一份报纸到达某所书院，就成为公共读物，所有学生都必须按照院方的要求，轮流观阅。看报是一项学习任务，报刊“为目前不可不看之书”。报刊被视为与书籍有同等意义的知识资源，书院师生通过阅读报刊，可以“开广见闻，启发志意”^[44]。因此，有识之士将《时务报》《湘学报》《湘报》视为必读之“书”，以区别于当时的商业报刊。读书人读“时务书”，便意味着通过时务报刊接触到新学，从而在知识体系上区别于“旧学”。

四、维新时期湖南报刊在士林中的影响

由于《湘学报》分门别类，“将群章甫缝掖之儒，讲求中西有用之学，争自濯磨。以图富强，以存遗种”^[45]。从而声名鹊起，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。著名学者谭献在读完《湘学报》第一册之后，便认为该报“以史学、掌故学、舆地学、算学、商学、交涉学为六条目，序例标揭，意言平实，非《时务报》矫徇鄙倍之比”^[46]。谭献此说虽值得商榷，但在一定层面反映了《湘学报》的确很有特色。同时，《湘学报》也在省外广为发行，如在京城任文渊阁校理的王同愈，于丁酉年(1897年)七月初六日，“阅建霞所创《湘学新报》三卷”^[47]。说明其在北京已有发行管道。

《湘报》《湘学报》通过各种途径传播，影响不断扩大。湖南名儒王闿运曾数次阅读《湘报》，他在1898年6月25日的

日记中记道：看《湘报》一月，有一分府官，正黄公度同里人，云保卫不成，臬请开缺，抚台慰留；抚亦被劾，朝廷慰留，爱惜人才如此^[48]。平时少有读报记录的王闾运，特地表明他已看了一个月的《湘报》，这对潜心于经学的他而言，已颇为不易。又如江西义宁的仁义书院，虽然是一所乡人捐资的乡村书院，但对新式报刊的价值却有深刻的认知。认为：《湘学新报》分史学、掌故、輿地、算学、商学、交涉六门，贯穿古今中外，讲求实用，每年末又附各门切要书目提要二页，指示门径，诚最便学者之书^[49]。而柏文蔚在维新时期组织邑人成立“阅书报社”，他虽然居住在安徽寿县的乡下，却有机会读到《湘学报》。他回忆道：梁启超在湖南创立“南学会”，出版之《湘报》，印刷亦同《申报》，吾人皆视为金科玉律^[50]。其时，中国的乡村社会很少有报刊出现，而在1896年高中秀才的柏文蔚，对“洋务”已有所了解，并通过在家乡创建“书报社”，以广见闻，《湘学报》能传入安徽偏僻的乡下，对柏文蔚思想观念的影响是无容置疑的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许多《时务报》的读者也通过各种途径阅读《湘学报》。如杭州的藏书家邵章在写给汪康年的信中提及：“《湘学报》适在友人处见之，极佳。请寄五分”^[51]，不久，他便询问：“《湘学报》到否？能否寄下五十分”，之后，他又在信中回应：“连日收到《湘学报》三十分，一到即行分罄，尚有索者。望再寄我二十分，至要”。可见当地读者对该报的阅读兴趣较高，作为代销商，他自然要求汪康年“请再寄二十分，勿延”^[52]。而经常阅读《时务报》的丘宪、陈庆年、高凤谦等人也订阅《湘学报》，丘宪特地来信告知汪康年：“《湘学报》乞仍代寄罗子敬处为祈”^[53]。陈庆年则“订《湘学报》一年，值钱八百八十文”^[54]。张元济还将订阅的《湘学报》，供“馆中同学所公阅也”^[55]。缪荃孙虽然代理《时务报》等报刊的发行，但却很难有机会在南京购阅《湘学报》，但由于与谭嗣同的私交甚厚，有机会向他借阅。1897年5月31日，他“读《湘学新报》，即还谭复生”^[56]。同样，《湘报》也广受读者欢迎。长期代理《时务报》发行的费麟生，曾转告汪康年，“可否乞代转告《湘报》分局，请其先寄十分或廿分至敝处，自十六册起至现在所出之册止。半月以后如悉售去，即可迳告分局添寄。如销数不满十分，仍将原报带呈分局”^[57]。读者作荣则写信给汪康年说：“初九接《湘报》第九册，廿一又接《湘报》第十、十一两册，惟中无函字，想见执事贤劳，管城子亦疲于奔命也。”另外，他还要求，“务请转函湘局，自第一至第八册补齐寄下”^[58]。可见，通过《时务报》的销售网络，《湘学报》《湘报》对外省读者也产生了一定影响。

五、结语

与甲午之前宗教报刊的说服式传播不一样，维新时期报刊传媒的组织化传播特色较为明显。维新报刊大多依赖于学会，而学会与学堂、书院又紧密结合，因此，维新报刊以社会组织为依托，利用各类社团广泛的文化和经济资本进行运作。维新报刊的发行，更是依赖了各类学会、学堂的公共资源，并通过各种人脉关系将发行网络延伸到边远地区，使一般读书人有机会接受维新思想的洗礼，这显然是之前宗教报刊无法做到的。因此，甲午之后，中国社会的启蒙，得益于维新刊物的广泛传播和阅读。

维新时期的地方性学会，是知识精英重塑主体性意识的重要标志。许多开明官绅的加入，又使一些舆论领袖找到了推广新思潮的舞台。学会办报首先保证了会员的阅读率，各地的学会利用报纸表达立场、弘扬学术、传播新知、团结同志，使维新报刊具有社会整合的作用。对读书人而言，加入学会不仅可以找到归属感，而且能够在组织中获得许多学习和交流的机会。尽管我们无法统计有多少学会成员在读报纸，但学会对会员读报的关注是毋庸置疑的。南学会开辟的书报阅览室，就表明它已经非常注重报刊的普及，并较早地创造出“公共读报空间”，读者在阅览室读报，具有“集体在场”的体验，读报纸不仅是获得新闻和知识，而且因“集体阅读”更具有仪式感。

与甲午以前中文报刊的阅读主要集中于少数官员与口岸文人不同，维新报刊通过它较为多元的发行系统渗透到州县以后，报刊阅读便从通商口岸延伸到城镇。而读者群体也由“都市之人”扩展到“城镇之人”，尽管上海、广州、天津这样的通商口岸仍然是报纸发行的重要区域，且是报纸读者较为集中的地方。但是，一些交通较为便利的中小城市，也会有新式报刊的传布，尤其是得风气之先的湖南，由于南学会大力鼓吹维新变法，大力创办报刊并推动发行，加上地方大员推行的“官费订报”活动，通过官府、书院和学堂进一步将报纸推广到县城之类的“镇”，对于这些中小城镇而言，报刊作为新式传媒开拓了舆论与文化空间，报刊将“城镇之人”与外部世界连接起来，除了足不出户而知天下事之外，维新时政与西学知识冲击了他们的思维方式，进而在“传统”与“现代性”之间彷徨与选择。正是由于维新思潮的深刻影响，在湖南一些报刊传播较为活跃的地区，出现了

“士绅社会”向“知识人社会”的过渡，一些开明的读书人通过报纸感知到社会思潮的脉动，从而逐步改变他们的阅读方式与思维模式。一些熟读经典的传统士人，在看到维新报刊之后，对“圣贤之书”产生了怀疑，在时局危殆的阅读背景下，他们的阅读趣味开始从“古典”走向“现代”，这体现出现代报刊传媒作为“思想纸”对读书人所产生的深刻影响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亨利·列斐伏尔. 空间: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 [M] //西方都市文化研究读本:第3卷. 王志弘, 译. 桂林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8:24.
- [2] Relph E. Place and Blamelessness [M] . London:Pion, 1976:25—30.
- [3] 曼纽尔·卡斯特. 网络社会的崛起 [M] . 夏铸九, 王志弘, 等译. 北京: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, 2006:394.
- [4] 克利福德·吉尔兹. 地方性知识 [M] . 王海龙, 等译. 北京:中央编译出版社, 2004:273, 19.
- [5] 李仁渊. 晚清新式传播媒体与知识分子:以报刊出版为中心的讨论 [M] . 台北:稻乡出版社, 2005:141, 145.
- [6] 方汉奇. 中国新闻事业通史:第1卷 [M] . 北京: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 1992:364.
- [7] 宋恕. 自强报公启 [M] //宋恕集. 北京:中华书局, 1993:260.
- [8] 丁文江, 赵丰田. 梁启超年谱长编 [M] . 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 1983:68.
- [9] 论学堂报馆须相辅而行 [N] . 国闻报, 1899—2—3.
- [10] 梁启超. 论学校十三(变法通议三之十三)学会 [J] . 时务报第10册, 1897—10—26.
- [11] 设学会以端国本说 [N] . 汇报第53号, 1899—2—25.
- [12] 汤志钧. 戊戌时期的学会和报刊 [M] . 台北:台湾商务印书馆, 1993:前言2.
- [13] 托克维尔. 论美国的民主:下卷 [M] . 董果良, 译. 北京:商务印书馆, 1989:699.
- [14] 蔡元培. 创办外交报叙例 [M] //蔡元培全集:第一卷. 北京:中华书局, 1984:137.
- [15] 蜀学会章程 [J] . 蜀学报第1册, 1898—4—5.
- [16] 本馆告白 [J] . 蜀学报第9册, 1898—7—3.
- [17] 宋育仁. 宋育仁函(一) [M] //汪康年师友书札(第1册). 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86:543.
- [18] 渝报章程十五条 [J] . 渝报第1册, 1897—11.

-
- [19] 开讲盛仪 [N] . 湘报第 1 号, 1898—3—7.
- [20] 湘学报第 11 册 [J] . 1897—12—14.
- [21] 陈宝箴. 湖南抚院陈飭各州县订购湘学新报札 [J] . 湘学报第 5 册, 1897—5—31.
- [22] 张之洞. 两湖督院张咨会湘学院通飭湖北各道府州县购阅湘学报公牒 [J] . 湘学报第 15 册, 1897—9—7.
- [23] 湘抚陈招考新设时务学堂学生示 [J] . 时务报第 43 册, 1897—10—26.
- [24] 南学会总会章程 [N] . 湘报第 35 号, 1898—4—15.
- [25] 湘报叙 [N] . 湘报第 1 号, 1898—3—7.
- [26] 熊希龄. 熊希龄集(第 1 册) [M] . 长沙:湖南人民出版社, 2008:74.
- [27] 湘报馆章程 [N] . 湘报第 27 号, 1898—4—6.
- [28] 汪叔子. 文廷式集(上册) [M] . 北京:中华书局, 1993:152.
- [29] 本报告白 [N] . 湘报第 1 号. 1898—3—7.
- [30] 衡州士绅开设俚语报馆禀并批 [N] . 湘报第 141 号. 1898—8—30.
- [31] 张翼云. 书唐才常时文流毒中国论后 [N] . 湘报第 95 号, 1898—6—26.
- [32] 蔡尚思, 方行. 谭嗣同全集(下册) [M] . 北京:中华书局, 1981:472.
- [33] 湘报后叙下 [J] . 湘报第 11 号, 1898—3—18.
- [34] 蔡尚思, 方行. 谭嗣同全集(上册) [M] . 北京:中华书局, 1981:262.
- [35] 湘报馆章程(续登) [N] . 湘报第 28 号, 1898—4—7.
- [36] 梁启超. 南学会叙 [J] . 湘学报第 25 册, 1898—12—14.
- [37] 李孝悌. 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 [M] . 石家庄:河北教育出版社, 2001:17.
- [38] 李抱一. 长沙报纸史略 [M] //近代史资料文库:第 9 卷. 上海:上海书店出版社, 2009:247.
- [39] 天平洋客. 新广东 [M] //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:第 1 卷(上册). 北京: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 1960:288.
- [40] 本馆刊报章程 [J] . 菁华报第 1 册, 1898—9—16.

-
- [41] 湘学开会记 [N] . 国闻报, 1898—6—2.
- [42] 南学会申订章程 [N] . 湘报第 75 号, 1898—6—1.
- [43] 廖寿丰. 浙抚廖分派各府县时务报札 [N] . 时务报第 18 册, 1897—2—22.
- [44] 王先谦. 岳麓院长王益吾祭酒购时务报发给诸生公阅手谕 [J] . 时务报第 18 册, 1897—2—22.
- [45] 湘学新报例言 [J] . 湘学报第 1 册, 1897—4—22.
- [46] 谭献. 谭献日记 [M] . 北京:中华书局, 2013:325.
- [47] 王同愈. 栩缘日记卷一 [M] //王同愈集. 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98:250.
- [48] 王闿运. 湘绮楼日记(第 4 册) [M] . 长沙:岳麓书社, 1997:2154.
- [49] 江西义宁县仁义书院变通冬课诗赋改为策论启 [J] . 知新报第 48 册, 1898—4—12.
- [50] 柏文蔚. 柏文蔚自述 [M] . 北京:人民日报出版社, 2011:8.
- [51] 邵章. 邵章函(二) [M] //汪康年师友书札(第 2 册). 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86:1220.
- [52] 邵章. 邵章函(七) [M] //汪康年师友书札(第 2 册). 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86:1222.
- [53] 丘宪. 丘宪函 [M] //汪康年师友书札(第 1 册). 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86:199.
- [54] 陈庆年. 横山乡人日记 [M] //近代史资料文库:第 1 卷. 上海:上海书店出版社, 2009:241.
- [55] 张元济. 张元济函(十九) [M] //汪康年师友书札(第 2 册). 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86:170.
- [56] 张廷银, 朱玉麒. 缪荃孙全集·日记(第 1 册) [M] . 南京:凤凰出版社, 2014:465.
- [57] 费麟生. 费麟生函 [M] //汪康年师友书札(第 4 册). 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89:3481.
- [58] 作荣. 作荣函(六) [M] //汪康年师友书札(第 4 册). 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89:3695.